

制度扭曲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一个综合分解框架^{*}

孙华臣 焦 勇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制度扭曲的关键性作用,尝试构建城乡收入差距演变机制的系统性解释框架,创新性地将其分解为要素生产力效应、制度扭曲效应和转移再分配效应,进一步结合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特征和地区差异,并基于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模拟预测了2020年与2030年的城乡收入差距状况。研究表明,制度扭曲效应逐渐取代要素生产力效应,成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贡献者,其贡献度高达67.8%,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更为明显。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倒U型”特征,但各地区到达“倒U型”曲线波峰的时间存在明显差异,大部分省份的波峰集中在2006年、2007年和2009年三个年份。数值模拟分析发现,若户籍制度改革到位并能实现新型城镇化目标,城乡收入差距会进一步缩小,而此时制度扭曲效应的贡献度不断下降,要素生产力效应的贡献度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坚定加强制度供给创新、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信心与决心,也进一步印证了当前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有效性。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 制度扭曲 全要素生产率 数值模拟技术

作者简介:孙华臣,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250011;
焦 勇(通讯作者),山东科技大学财经系讲师、博士,250031。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9)03-0130-17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有效制度供给和政策体系创新,赋予农村更加均等的发展机会,能够降低城市部门对城乡融合的抵制和减少城市偏向,有利于促进城乡二元结构融合(王永钦、高鑫,2016)。这进一步明晰并强调了制度因素在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及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从历史视角看,城乡收入差距根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实施的户籍管理制度,它导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城乡收入差距演变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16FJL005);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促进我省乡村振兴:理论机理与实现路径”(18BSJJ04)。作者感谢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教授、山东大学韦倩教授和山东财经大学谢申祥教授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致了稳定的城乡二元分割并成为“农业补贴工业、乡村支持城镇”的政策基础,在黏合改革前城乡关系以及导致城乡收入和福利差距的制度安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蔡昉,2003),使城乡收入分配在违背资源配置比较优势规律的状态下与均衡路径渐行渐远。这种出于城镇单方面利益考虑而分割城乡的做法不利于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阻碍了城乡从分割到融合的转变(陈钊、陆铭,2008),同时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及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了整体的经济效率(田新民等,2009)。文献研究证实,城乡收入差距占整体不均等的份额在50%以上,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组成部分(林毅夫等,1998;李实等,1999;万广华,2013;Kanbur和Zhang,2005;Wan,2007)。也就是说,如果在全国加总层面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就可以使整体不均等程度减半(万广华,2013)。因此,在更大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将成为实现地区间劳动生产率趋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直观而言,城乡收入差距源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回报的城乡差异,但在很大程度上要素回报与所处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Acemoglu和Robinson,2000)。说到底,城乡收入差距演变是各种制度力量相互博弈并综合作用的过程,制度作用的净影响决定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这种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已经形成共识的是,以户籍管理制度、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为代表的具有明显城镇偏向的制度安排,改变了传统的城乡利益关系,诱发制度变迁偏离均衡,同时形成了符合城镇偏向的城乡利益格局(蔡昉,2003;Yang,1999),使城乡之间保持着特定的制度距离(Kostova,1996),同时也使城乡关系长期处于制度扭曲的状态。林毅夫等(1994,2003,2013)、蔡昉等(2003)、蔡昉和扬涛(2000)、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均证实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虽然政府逐步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但由此战略衍生的若干制度或政策,如城镇偏向的财政再分配政策(雷根强、蔡翔,2012)、教育经费投入政策(陈斌开等,2010;韩其恒、李俊青,2011)等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决定因素。概括而言,城乡制度不均衡供给程度越大、扭曲程度越严重,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

既然制度扭曲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变量,那么如何科学度量其作用的大小则是面临的现实难题。鉴于此,本文深度挖掘由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这种理想状态到现实状态的演变机理,构建城乡收入差距演变机制的综合分解框架,进一步结合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采用中国经验数据重新审视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机制、特征和地区差异。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分析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城镇经济系统的运行特征,以及现实状态下“农民-农民工-市民”这种具有明显“半城镇化”特征的人口结构,建立城镇经济系统的均衡条件,给出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测度;二是统筹考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结合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两种状态下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差异,抓住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资源要素错配、制度供给不均衡等关键特征和再分配环节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城乡差别,将城乡收入差距演变机制分解为要素生产力效应、制度扭曲效应和转移再分配效应;三是依托综合分解框架,结合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采用数值模拟技术勾画了2020年和2030年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情景。研究发现,制度扭曲效应将逐渐取代要素生产力效应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这将证实以体制机制创新和破解制度障碍为己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缩小城乡制度距离,同时为研究制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关政策举措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解框架;第三部分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和演变机制分解;第四部分是基于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目标的数值模拟;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解框架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城乡两部门的制度安排、资源配置趋于均衡,并不存在所谓的政策偏倚、要素错配等现象,此时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源于部门和产业分工不同而产生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差别,如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城镇部门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明显高于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村部门,本文将因要素分工不同而产生的城乡收入差距定义为要素生产力效应。与完全竞争条件不同,在更为符合经济运行实际的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城乡两部门之间不仅存在要素生产效率的差别,而且存在制度供给不均衡、制度安排不合理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问题,锁定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演变路径。相比要素分工差异,制度供给不均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根本。基于此,本文将制度供给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定义为制度扭曲效应。

以上提到的要素生产力效应、制度扭曲效应,主要涵盖了城乡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再分配环节主要涉及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影响,这与政府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从党的十五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十六大明确“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十八大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进一步明晰了再分配调节的重要性。然而,的确存在一些扩大收入差距的制度安排(王延中等,2016)。以2012年为例,不考虑转移性收入时城乡收入差距为2.52,考虑转移性收入时城乡收入差距则扩大到3.10(见图1)。基于此,本文将再分配环节政府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定义为转移再分配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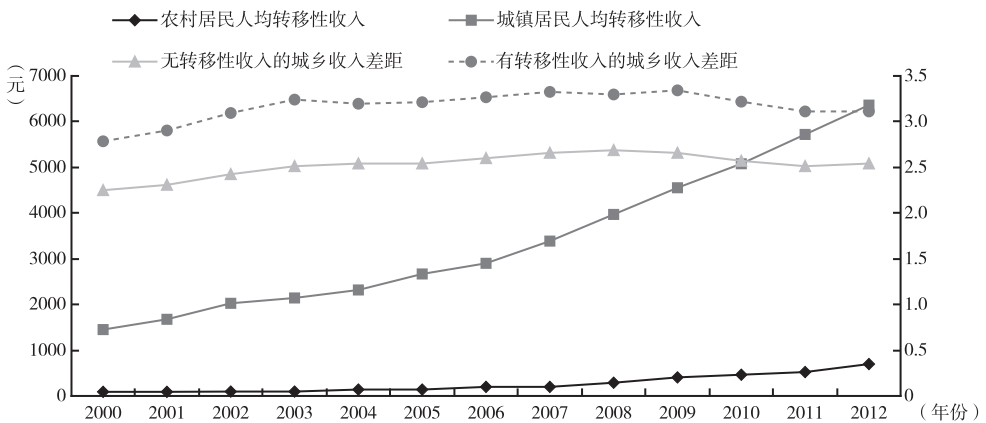


图1 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综上,本文遵循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这种状态演变的理论逻辑,将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城镇、农村两个部门,在更深层次上细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分解。正如前文所述,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要素密集度和丰裕度的异质性,这是在统一制度框架下因分工不同而产生的正常差距,即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要素生产力效应。

(一)完全竞争条件

1. 农村部门

近年来,国家大力鼓励农村规模经营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现阶段农村经济仍以小农经营和相对单一的农业生产为主。因此,在抽象考察农村部门的生产行为时,

仍假设以劳动力、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由此构建农村经济部门的生产函数:

$$Y_n = F(T, L_n) = T^\alpha (A_n L_n)^{1-\alpha} \quad (1)$$

其中, F 代表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是关于劳动力和土地的函数关系; Y_n 是农业部门的产出水平, T 代表土地规模, L_n 代表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 A_n 代表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具体表现为劳动提升型技术进步类型;系数 α 代表土地的投入份额。根据式(1)可得农村部门的平均收入水平为:

$$\omega_n = \frac{Y_n}{L_n} = A_n^{1-\alpha} \left(\frac{T}{L_n} \right)^\alpha \quad (2)$$

2. 城镇部门

(1)企业生产行为。考虑到城镇部门主要通过企业从事生产产品和服务生产的行为创造价值,因此以 Ramsey-Cass-Koopmans(RCK)模型为基础,假设城镇部门的微观决策单元(企业)面临的生产函数满足哈罗德中性,即 $Y_t = F(K_t, A_t L_t)$,则企业 C-D 型生产函数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显性表达式为:

$$Y_t = K_t^\alpha (A_t L_t)^{1-\alpha} \quad 0 < \alpha < 1 \quad (3)$$

其中, Y_t 表示城镇部门的产出水平, K_t, L_t 分别代表 t 时期企业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水平, A_t 为企业的技术水平,并且满足 $\dot{A}_t/A_t = g, g$ 为技术进步水平。企业产出将在消费和投资两种行为中得到最优配置,假设资本存量的折旧速率为 δ ,可建立资本积累方程:

$$\dot{K}_t = Y_t - C_t - \delta K_t \quad (4)$$

式(4)中,资本折旧率 $\delta > 0$,所以资本的动态变化方程为:

$$\dot{k}_t = y_t - c_t - (n + g + \delta)k_t \quad (5)$$

式(5)中, \dot{k}_t 代表资本的动态变化, y_t, c_t 分别是 t 时期的产出和消费, n 代表人口增长率,所以 $(n + g + \delta)k_t$ 为资本积累进程中需要花费的持平投资部分,包含劳动力增长、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共计三项“资本广化”投资。

(2)消费者行为。消费者在全生命周期瞬时效用的贴现值构成了消费者总的效用现值,故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形式为:

$$U = \int_{t=0}^{\infty} e^{-\rho t} u(C_t) dt \quad (6)$$

本文构建相对风险厌恶不变(CCRA)的效用函数,瞬时效用函数 $u(C(t)) = \frac{C(t)^{1-\theta}}{1-\theta}$,其中 $\theta > 0$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以及约束条件满足:

$$\max U = \int_{t=0}^{\infty} e^{-\rho t} u(c_t) dt \quad (7)$$

$$\text{s. t. } \begin{cases} \dot{k}_t = y_t - c_t - (n + g + \delta)k_t \\ y_t = k_t \end{cases} \quad (8)$$

综合微观企业生产决策和消费者消费决策模型,城镇经济部门的均衡解(k^*, c^*)可以表示为:
$$\left(\left(\frac{\alpha}{n+g+\delta+\rho} \right)^{\frac{1}{1-\alpha}}, (1-n-g-\delta) \left(\frac{\alpha}{n+g+\delta+\rho} \right)^{\frac{1}{1-\alpha}} \right)。$$

(3)系统均衡。通过城镇部门平衡增长路径的均衡资本和消费表达式,可以获得 BGP 路径中的人均有效产出水平:

$$y = \left(\frac{\alpha}{n+g+\delta+\rho} \right)^{\frac{\alpha}{1-\alpha}} \tag{9}$$

再次回到 RCK 模型之中,人均有效产出水平和总产出水平之间满足: $Y_t = y_t \cdot (A_t L_t)$ 。其中,技术进步速率 $\dot{A}_t/A_t = g$ 。技术进步总是建立在已有技术水平上持续发展,假设第一期技术水平为 1,则以第一期为基准状态,可获得指数型技术进步的显性公式:

$$A_t = (1+g)^t \tag{10}$$

根据上述推导过程,产出水平可以具体表示为关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关系式:

$$Y = \left(\frac{\alpha}{n+g+\delta+\rho} \right)^{\frac{\alpha}{1-\alpha}} (1+g)^t L_t \tag{11}$$

3. 城乡收入差距

结合式(11),该式除以 L 即为平均收入水平。那么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平衡增长路径之中,城镇部门的平均收入水平可以表示为:

$$\omega_c = \frac{Y}{L_t} = \left(\frac{\alpha}{n+g+\delta+\rho} \right)^{\frac{\alpha}{1-\alpha}} (1+g)^t \tag{12}$$

结合农村部门的平均收入水平式(2)以及城镇部门的平均收入水平式(12),则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表示为:

$$Effic = \frac{\omega_c}{\omega_n} = \frac{\alpha^{\frac{\alpha}{1-\alpha}} (1+g)^t L_n^\alpha}{(n+g+\delta+\rho)^{\frac{\alpha}{1-\alpha}} A_n^{1-\alpha} T^\alpha} \tag{13}$$

式(13)同时表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要素生产力效应,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工业生产的技术进步水平以及农业生产劳动力的数量、土地资源和农业技术等。

(二)不完全竞争条件

不同于完全竞争这一理想假设,不完全竞争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如制度偏向、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现象广泛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乡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使城乡收入差距超出合理的范畴。本部分围绕由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这种内在特征变化,聚焦户籍等具有明显城镇偏向的制度因素,分解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扭曲效应。

1. 农村部门

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假设农村部门的生产决策方式和行为特征均不发生改变,生产行为依然符合 C-D 型特征,参照完全竞争条件下农村部门的平均收入水平,所以有:

$$\omega_n = \frac{Y_n}{L_n} = A_n^{1-\alpha} \left(\frac{T}{L_n} \right)^\alpha$$

2. 城镇部门

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城镇部门的企业生产差异化的产品并面临垄断竞争的产品市场,企业定价不再遵循完全竞争的市场规则,主要由劳动收益水平和生产效率决定。本文延续但又不完全等同于 Melitz (2003) 的思想,只考虑包含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一般均衡条件。根据杨曦、彭水军(2017)的设定,产品定价满足:

$$p(\phi) = \omega/\phi \tag{14}$$

其中, ω 是劳动收益率加权值,所以有 $\omega = \omega_l^{\theta_1} \omega_h^{1-\theta_1}$, 企业生产投入的劳动资源有两种,即熟练型和非熟练型, θ_1 衡量非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密集度。在不考虑企业投入固定成本的条件下,企业的人力资本成本函数满足:

$$c(\phi) = (\omega_l^{\theta_1} \omega_h^{1-\theta_1})/\phi \tag{15}$$

式(15)中, $c(\phi)$ 为企业生产成本关于生产效率的函数表达,企业生产成本是关于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密集投入的增函数,是关于生产效率的减函数。那么,在垄断竞争市场中,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生产决策条件,企业边际收益等于式(15)的一阶导数。同时,在零利润条件下,企业边际收益也是企业对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的投入水平。基于此,企业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函数分别为:

$$m_l = \theta_1 (\omega_l/\omega_h)^{\theta_1-1}/\phi \tag{16}$$

$$m_h = (1 - \theta_1) (\omega_l/\omega_h)^{\theta_1}/\phi \tag{17}$$

企业生产效率的获取构成了企业进入行业的决定条件。自然状态下,企业生产效率值服从帕累托分布 $g(\phi)$, 满足:

$$g(\phi) = 1 - (\phi_{\min}/\phi)^k \tag{18}$$

其中, ϕ_{\min} 、 ϕ 分别代表企业生产效率的最小值与实际值。在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下,企业对要素的需求总量等于要素供给总量,且满足如下等式关系:

$$\int_{\phi_*}^{\infty} m_l dg(\phi) = L_l; \int_{\phi_*}^{\infty} m_h dg(\phi) = L_h \tag{19}$$

据此可以解出生产要素市场出清条件下的要素收益率,同时可得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即收益率差距为:

$$\omega_h/\omega_l = (1 - \theta_1) \theta_1^{-1} L_l L_h^{-1} \tag{20}$$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受要素“供给端丰裕程度”和“需求端需求强度”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非熟练劳动力与熟练劳动力的比率 L_l/L_h 越大,则要素市场中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就越高,熟练劳动力将愈显稀缺,其相对价格即工资水平也越高;另一方面,要素密集度比率 $(1 - \theta_1) \theta_1^{-1}$ 越大,企业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就越小,则越需要熟练程度高的人力资本,其相对价格即工资水平也会提高。

3. 城乡收入差距

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农村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构成了“城镇 - 农村”两个经济

部门非熟练劳动力转换的均衡工资水平值。本文假设 $\omega_l = \omega_n$, 给出该假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建立在市场出清条件下, 非熟练劳动力在两个经济部门实现均衡配置的结果; 二是伴随着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甚至接近于 0 时, 农村劳动力实现动态平衡的必然结果。所以城镇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

$$\omega_h = \frac{(1 - \theta_1)L_l}{\theta_1 L_h} A_n^{1-\alpha} \left(\frac{T}{L_n}\right)^\alpha \quad (21)$$

经济系统总就业人数为 $L = L_l + L_h + L_n$, 则城镇经济系统中的人均工资水平为:

$$\omega_c = \frac{L_l}{L_l + L_h} A_n^{1-\alpha} \left(\frac{T}{L_n}\right)^\alpha + \frac{L_h}{L_l + L_h} \frac{(1 - \theta_1)L_l}{\theta_1 L_h} A_n^{1-\alpha} \left(\frac{T}{L_n}\right)^\alpha \quad (22)$$

综合考察式(2)和式(22), 化简可得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城乡收入差距表达式:

$$Range = \frac{\omega_c}{\omega_n} = \frac{1}{\theta_1} \frac{L_l}{L_l + L_h} \quad (23)$$

由此可以得出, 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受产业技术结构(生产要素的密集度)以及城镇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份额的影响。此时, 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的函数表达式可以简化为不含“农村”“收入”的函数表达式。从经济逻辑看, 本文试图从城乡联动的角度进行考察, 若分别考察两个部门的收入水平, 则由此构建的城乡收入差距仅由大量并无内在联系的变量组成, 两个部门是绝对分离的, 导致城镇(或农村)对农村(或城镇)而言, 所有的变量都是外生的, 并不符合城乡一体化的现实背景。式(23)中, 城镇和农村的收入通过 $\omega_l = \omega_n$ 连接, 所以两个部门的收入水平能够建立统一的识别机制, 这样就抽象掉农村的因素。同时, 城乡收入差距是城镇和农村平均收入水平的比值, 自然就抽象掉了收入的因素。

(三) 城乡收入差距分解

根据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要素生产力效应, 可以分离出制度供给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即制度扭曲效应为:

$$Insti = \frac{(n + g + \delta + \rho)^{\frac{\alpha}{1-\alpha}} A_n^{1-\alpha} T^\alpha L_l}{\theta_1 \alpha^{\frac{\alpha}{1-\alpha}} (1 + g)^t L_n^\alpha (L_l + L_h)} \quad (24)$$

结合前文所述, 在初次分配框架下, 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创新性地划分为要素生产力效应和制度扭曲效应:

$$R = \underbrace{\frac{\alpha^{\frac{\alpha}{1-\alpha}} (1 + g)^t L_n^\alpha}{(n + g + \delta + \rho)^{\frac{\alpha}{1-\alpha}} A_n^{1-\alpha} T^\alpha}}_{\text{要素生产力效应 (Effic)}} \cdot \underbrace{\frac{(n + g + \delta + \rho)^{\frac{\alpha}{1-\alpha}} A_n^{1-\alpha} T^\alpha L_l}{\theta_1 \alpha^{\frac{\alpha}{1-\alpha}} (1 + g)^t L_n^\alpha (L_l + L_h)}}_{\text{制度扭曲效应 (Insti)}} \quad (25)$$

综合考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 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要素生产力效应(Effic)、制度扭曲效应(Insti)和转移再分配效应(Trans)三个因子, 即:

$$R^* = R \cdot Trans = Effic \cdot Insti \cdot Trans \quad (26)$$

关于转移再分配效应的衡量未直接采用政府对城镇、农村转移支付绝对额的比值, 更为科学

的计算方法是分为不考虑政府转移支付和考虑政府转移支付两种情境,这两种情境下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构成转移再分配效应,即:

$$Trans = R^* / \left[\frac{Y_c - Y_c(Trans)}{Y_n - Y_n(Trans)} \right] = \left(\frac{Y_c}{Y_n} \right) / \left[\frac{Y_c - Y_c(Trans)}{Y_n - Y_n(Trans)} \right] \quad (27)$$

式(27)中, Y_c 、 Y_n 分别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Y_c(Trans)$ 、 $Y_n(Trans)$ 分别表示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收入绝对额和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收入绝对额。

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和演变机制分解

(一)关于 TFP 的测度

城乡收入差距理论分解的要素生产力效应及制度扭曲效应涉及技术水平 A_t 及其动态变化 $A_t/A_{t-1} = g$, 而 A_t 的内涵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TFP), g 衡量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进行城乡收入差距分解,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制度供给创新,统筹优化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资源要素配置”的内在要求高度一致,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本质不谋而合。从大的趋势看,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同步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测度要素生产力效应和制度扭曲效应的核心变量。^①

在计算 TFP 的过程中,参照了高宇明、齐中英(2008)的处理方式,采用不变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产出指标,基础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无论是 C-D 生产函数法还是曼奎斯特指数所测算的 TFP 数值,均需要测算各地区资本存量(K)和劳动力投入(L)的数值。其中,资本存量的基期数值来源于张军、章元(2003)的研究成果,资本折旧率设定为 9.6% (张军等,2004),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进而依据永续盘存法计算各地区历年的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K_t = (1 - \sigma_t)K_{t-1} + I_t$ 。其中, K_t 为第 t 年的资本总量。劳动力投入指标为各地区的就业人数,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度的代理变量为历年各地区 6 岁及以上人口数减去 6 岁及以上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程度人口数,从而获得非大专以上学历程度人口数,然后除以 6 岁及以上人口数,可获得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度的代理指标值。^② 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年末常住人口数、农业从业人口数、农业增加值等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对于部分指标缺失的数据,采用前后项的算术平均值进行插值,从而获得完整的平衡面板数据。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2000—2012 年。

表 1 汇报了样本区间内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的 TFP 增长率。从全国层面看,2000—2012 年中国 TFP 水平呈波动下降趋势,TFP 增长率由 2000 年的 3.93% 下降到 2012 年的 0.70%,增长动能不断弱化。从地区层面看,TFP 增长率总体上呈现东部地区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低的态势。相对而言,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最为明显,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动力。改革开放 40 年

① TFP 的估计方法为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 TFP 数值的客观性和数据包络分析获得省际 TFP 的相对排名相融合,给出 TFP 的组式计算方法,即以 C-D 法测算的 TFP 为基础,曼奎斯特指数测算结果作为权重调整系数,构建加权的 TFP 指标。由于篇幅所限,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② 感谢匿名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本文所选择的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度指标属于宽口径下的统计结果,不考虑 6~15 岁人口、老年人等不纳入劳动力范畴的影响,非熟练劳动力指标构成的分母均采用 6 岁及以上人口数,这种处理并不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度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均为 1% 人口抽样调查,选择 6 岁及以上人口数以及受教育程度人口数指标,具有更强的逻辑一致性,并且作者考察了 6 岁及以上、15 岁及以上两种不同年龄划分标准下的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度,发现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 0.9989,指标差异性很小,选择不同参照系并不会产生显著差别。

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然而,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要素的密集投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能源资源的不断消耗,是低水平、低效率、不可持续的粗放型增长,这与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下降的趋势是内在一致的,同时证实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也不足以支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长期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段,增长的动力源由投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增长红利由资源环境红利、人口红利向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和人才红利转变,这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蓄势酝酿的重要阶段。

表 1 2000—2012 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 TFP 增长率 单位: %

地区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均值
东部	5.31	5.45	5.32	4.78	4.32	3.33	3.95	4.82	1.77	1.28	2.85	2.44	2.30	3.69
中部	3.60	3.83	3.68	3.23	3.36	1.44	0.21	0.58	-0.53	-2.53	0.00	0.46	0.13	1.34
西部	2.89	2.25	1.83	0.79	1.63	0.64	1.34	2.40	1.40	-0.51	-0.57	0.88	-0.39	1.12
全国	3.93	3.79	3.55	2.84	3.03	1.80	1.97	2.79	1.04	-0.39	0.79	1.33	0.70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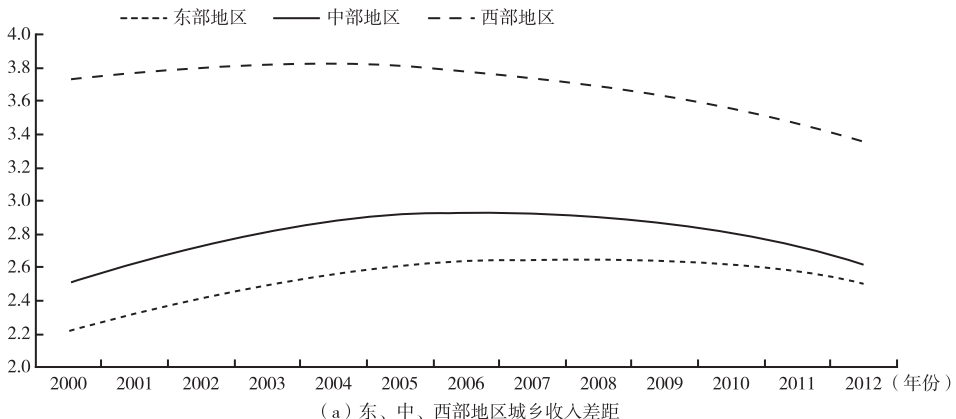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二) 分解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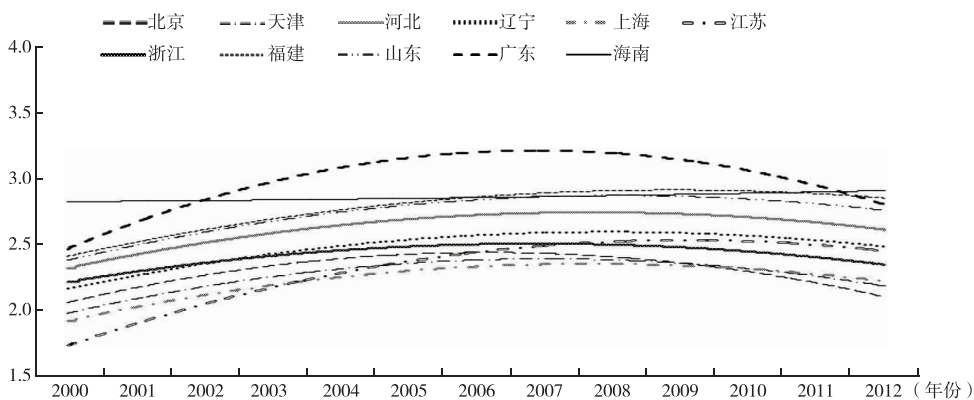
依据理论分解框架和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①,结合城乡收入差距分解的式(13)、式(24)和式(27),可获得要素生产力效应、制度扭曲效应和转移再分配效应的大小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

1. 总体演变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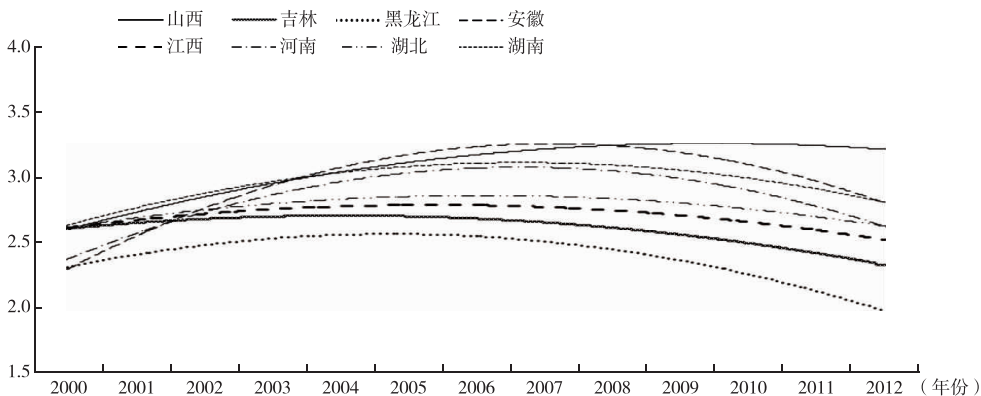
根据测度的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体数值,图 2 分别描绘了东、中、西部及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结果显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呈现显著的“倒 U 型”特征,这与万广华(2013)采用全国层面数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分区域看,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平均水平反而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最小,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从均值看,2000—2012 年东部地区的上海、天津、北京、江苏是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四个地区,分别为 2.22、2.26、2.29、2.29;中部地区的湖北、河南、湖南、安徽等的城乡收入差距处于中间位置;西部地区的甘肃、贵州、云南、西藏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分别达到 3.94、4.12、4.35、4.48。从这一角度看,“公平”与“效率”并不矛盾,效率较高的地区实现公平的可能性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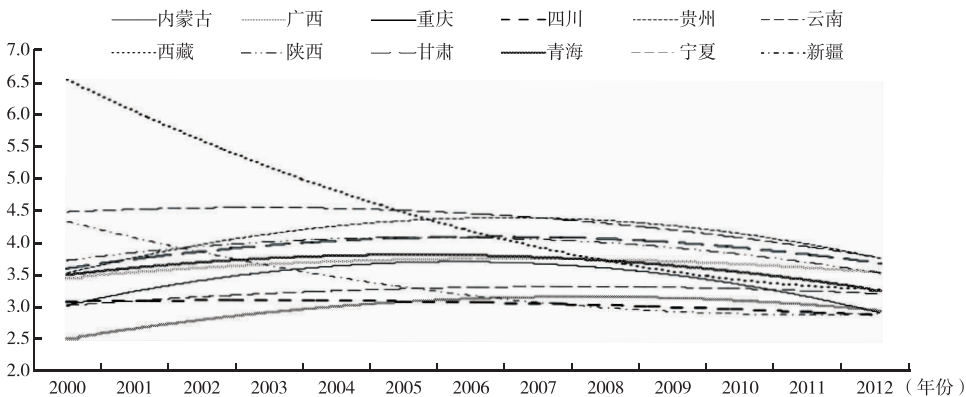
① 城乡收入差距分解中,还涉及农村部门的全要素生产力 A_n 测算,由于篇幅所限,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b) 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



(c) 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



(d) 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

图2 东、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演变趋势

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演变规律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具有普遍意义,但各地到达曲线波峰的时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大部分省份的波峰集中在2006年、2007年和2009年三个年份,但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没有形成明显的规律,如东部地区北京的城乡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1.93逐步上升到2004年的2.53,随后缓慢下降到2012年的2.21;中部地区湖北的城乡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2.60上升到2006年的2.87,2012年差距缩小为2.65;西部地区宁夏的城乡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09波动上升到2008年的3.51,随后逐步下降到2012年的3.21。如果按照库兹涅茨假说

(Kuznets, 1955)判断,我国所有地区均已跨越“倒U型”曲线的拐点,处于曲线的下降阶段,此时进一步释放协调发展红利,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更有效率、更为公平、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政策努力的方向。

2. 城乡收入差距分解

表2汇报了要素生产力效应、制度扭曲效应及转移再分配效应对总体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图3描绘了各种效应的演变轨迹。从中可以发现,制度扭曲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最大,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制度扭曲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从2000年的32.3%上升到2004年的54.6%,随后进入短暂的平稳通道,2007年开始受制度供给的影响快速提升,到2012年制度扭曲效应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达到67.8%,即制度供给因素能够解释2/3以上的城乡收入差距,这也印证了本文最初的推断。以户籍管理制度为基础形成的一系列分割城乡、偏向城镇的制度安排,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金融资源配置、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给,导致城乡要素配置严重扭曲,锁定了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难以缩小的制度路径。近年来,国家在政策导向、制度安排上更加趋向均衡,出台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具体意见,针对农村发展薄弱环节制定了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若干政策举措,着力补齐农村发展的制度短板。随着政策和改革红利的逐渐显现,城乡收入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迹象,全国层面开始下降,由2010年的3.22降至2015年的2.73。

表2 城乡收入差距贡献度分解 单位:%

类型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要素生产力效应	38.9	36.5	32.7	28.6	25.4	31.5	31.7	17.8	22.9	32.2	17.3	10.5	15.6
制度扭曲效应	32.3	38.2	44.6	50.6	54.6	48.9	49.7	64.8	60.3	50.9	64.4	71.6	67.8
转移再分配效应	28.7	25.2	22.7	20.8	20.0	19.6	18.6	17.5	16.8	16.9	18.3	17.9	16.7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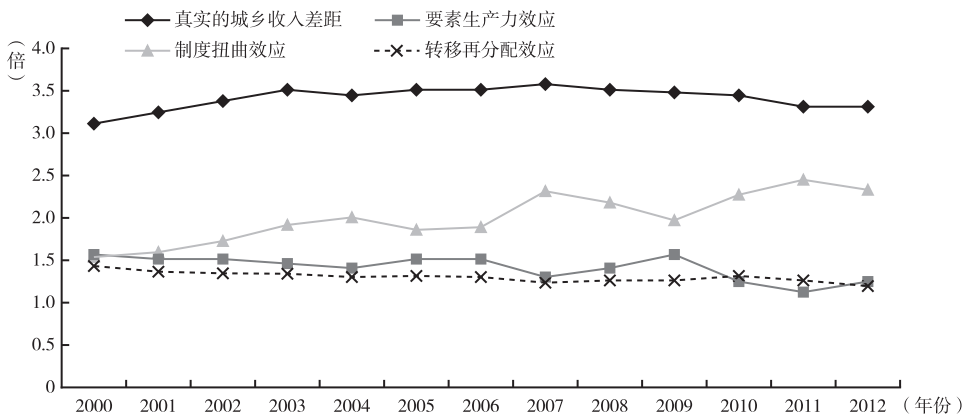


图3 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分解

注:根据2000—2012年城乡收入差距的分解,获得各个省份的数值,基于各个省份对应指标的算术平均值,获得城乡收入差距分解项的全国平均值;分解的三项乘积构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代表值。

要素生产力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总体上在逐步减弱。2000年,因城乡要素生产力差异而产生的城乡收入差距,其贡献度达到38.9%,属于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到2012年,要素生产力效

应的贡献度下降到 15.6%。这也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和外部条件越来越完善,生产要素能够更加自由地在城镇、农村间流动,并得以配置到更有效率的领域。

转移再分配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总体上处于缓慢下降的通道中。2000 年这一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 28.7%,2012 年这一影响系数数值下降为 16.7%。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转移再分配效应的贡献度依然超过要素生产力效应,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第二大因素,其中的政策含义是城乡均衡发展将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和百姓福祉,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地区层面分解

表 3 汇报了 2000 年、2006 年和 2012 年地区层面城乡收入差距的分解结果。从中可以发现,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制度扭曲效应逐渐取代要素生产力效应,成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贡献者。这也充分表明城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差别虽然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因素,但在更深层次上取决于城乡有效制度供给,并且制度扭曲效应的影响更长久、更持续。

具体而言,要素生产力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不同地区要素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存在显著差别。总的来看,要素生产力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处于不断下降的通道中,但下降过程中波动较为明显,反映地区间生产效率差异所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由较为均衡的稳定状态转变为不稳定的波动状态。从具体地区看,2012 年要素生产力效应贡献最大的地区是上海,数值达到 125.5%。山西、山东、河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陕西和甘肃 9 个省份的城乡资源要素配置相对合理,生产效率差别并不显著。

表 3 地区层面城乡收入差距贡献度分解 单位:%

省份	2000 年			2006 年			2012 年		
	要素生产力效应	制度扭曲效应	转移再分配效应	要素生产力效应	制度扭曲效应	转移再分配效应	要素生产力效应	制度扭曲效应	转移再分配效应
北京	48.1	-0.4	52.4	46.4	24.7	29.1	44.1	32.8	23.6
天津	51.4	8.4	40.1	70.7	-23.9	53.1	18.5	38.9	42.6
河北	50.2	0.6	49.2	46.7	23.5	29.8	13.7	56.5	29.8
山西	40.2	24.2	35.6	53.4	26	20.6	4.9	76.7	18.5
内蒙古	39.1	39.4	21.5	50.6	36.6	12.8	-10.1	104.5	5.6
辽宁	46.9	19.6	33.5	52.4	5.2	42.3	11.8	51.4	36.8
吉林	53.9	11.5	34.6	74.3	0.5	25.2	-35.3	108.4	26.9
黑龙江	54.2	-6.7	52.5	49	23.6	27.4	29.6	29.4	41
上海	45.6	-81.9	136.6	70.2	7.6	22.1	125.5	-32.8	6.8
江苏	71.8	-62.5	90.8	37.1	27.8	35.2	12.3	61.3	26.4
浙江	45.8	-1.8	56	29.8	49.6	20.6	15.8	55.4	28.8
安徽	54.9	16.6	28.5	38.3	42.3	19.4	14.9	61.1	24
福建	47.5	27.9	24.5	30.8	49.3	19.9	11.6	72.2	16.2
江西	45	25.1	29.9	30.9	44.6	24.4	-1.7	74.3	27.4
山东	51.3	31.8	16.9	32.1	54	13.9	7.4	78.2	14.5

续表 3

省份	2000 年			2006 年			2012 年		
	要素生产力 效应	制度扭曲 效应	转移再分配 效应	要素生产力 效应	制度扭曲 效应	转移再分配 效应	要素生产力 效应	制度扭曲 效应	转移再 分配效应
河南	53.9	4.9	41.2	55.6	19.3	25.1	1	74.4	24.5
湖北	52.4	17.9	29.7	34.1	42.7	23.2	28.9	42.2	29
湖南	46.8	24.6	28.6	32.6	47.2	20.2	5.4	72.8	21.8
广东	47.7	40.5	11.8	31.9	56	12.1	33.8	53.4	12.7
广西	37.5	52	10.5	30.7	52.3	17	5.7	77.1	17.2
海南	34.8	56	9.2	49	31.1	19.9	86.7	-5.3	18.6
重庆	47.7	8	44.3	17.2	69.6	13.2	2	78.3	19.7
四川	39.3	29.6	31.1	34.9	41.5	23.6	19.7	61.6	18.7
贵州	45	20.8	34.2	12.6	75.9	11.5	1.9	80.6	17.5
云南	34.8	47.6	17.6	14.1	65.5	20.4	11.2	74	14.8
西藏	23.3	82.2	-5.6	13	83.8	3.2	-6.1	109.7	-3.7
陕西	33.7	39.6	26.8	25.7	56.6	17.7	2.1	79.4	18.5
甘肃	34	52.5	13.5	16.3	69.6	14	1.4	83.9	14.7
青海	41.5	24.9	33.7	15.4	63.7	20.9	38.9	45.5	15.6
宁夏	32.6	46.4	21	17.7	63	19.3	-11.4	92.2	19.2
新疆	31.1	46	22.9	30.5	56.5	13.1	20.6	71	8.3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2000—2012 年,制度扭曲效应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在不同地区间表现趋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制度扭曲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较小;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其制度扭曲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较大,但整体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态势。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天津,其制度扭曲效应的贡献度分别由 2000 年的 -0.4% 、 -81.9% 、 8.4% 演变为 2012 年的 32.8% 、 -32.8% 、 38.9% ;西部地区宁夏、甘肃的指标数值则由 2000 年的 46.4% 、 52.5% 上升到 2012 年的 92.2% 、 83.9% ,制度扭曲效应的决定性地位越发明显。带有明显城镇偏向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安排引致资源要素的不平等分配,固化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路径。从表 3 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上海、北京、天津的制度扭曲效应数值接近于 1^①,甚至低于 1,相应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较小甚至为负,2012 年上海的制度扭曲效应为 0.74、贡献度为 -32.8% 。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城乡收入差距分解中,并没有考虑“摩擦”的作用,

① 衷心感谢匿名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即补充对制度扭曲效应小于 1(其贡献度为负)的解释。在文后的实际测算中也可以看到,存在部分地区的制度扭曲效应小于 1 的情形。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制度扭曲指向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机制设计下,城镇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农村地区配置,不断提高农民的转移支付水平,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制度扭曲效应数值小于 1。第二,理论测算和实际运算中可能存在的摩擦因素,导致要素生产力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提升,而制度扭曲效应的贡献度降低,从而出现制度扭曲效应数值偏低甚至低于 1 的情形。

进而导致要素生产力效应数值偏大,客观上降低了制度扭曲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结果也说明了制度供给差异所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出现了下降势头,即“城镇反哺农村”的效果更为显著,这与总体上判断城乡收入差距“倒U型”演变的轨迹不谋而合。从“农业补贴工业、农村支持城镇”到“工业支持农业、城镇反哺农村”,再到最后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发展格局,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并不存在制度扭曲所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存在以“反哺”为策略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机制。所以,新时期的制度扭曲并不仅仅会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也可能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就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现路径,充分表明了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已跨越“倒U型”的拐点,由发展“土地城镇化”向发展“人的城镇化”转变,由注重局部地区增长向注重地区普惠发展转变,更加关注协调、均衡、平等,更加关注公共服务均等、民生不断改善、社会全面进步,最终实现城乡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和要素自由双向流动,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

转移再分配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总体上在变小,如上海转移再分配效应的贡献度由2000年的136.6%逐步下降到2006年的22.1%,并最终下降到2012年的6.8%,这意味着对城镇和农村的人均转移支付更加公平。西部地区转移再分配效应的贡献度也在不断下降,如新疆转移再分配效应的贡献度由2000年的22.9%下降到2006年的13.1%,并最终下降到2012年的8.3%,这进一步证实了政府对城镇、农村的转移支付逐渐趋于均衡合理。

四、基于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目标的数值模拟

制度扭曲是多方面的,如教育医疗、财税金融等诸多领域的政策安排均具有明显的城镇偏向。户籍制度作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其影响更为根本、更为长远,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缺口是制度扭曲的具体表现。蔡继明(1998)、姚先国和赖普清(2004)、万海远和李实(2013)及Sicular等(2007)发现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也是导致制度扭曲的重要因素。因此,选择户籍制度作为典型制度来模拟分析制度扭曲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演变趋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各省份相继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明确了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任务目标,也为本文深化城乡收入差距分解提供了典型范例。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需要提供教育、健康等一系列服务,同时使低技能劳动力顺利转换为高技能劳动力、健康人力资本(王弟海,2012),其实质是熟练劳动力数量增加和非熟练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的过程。

通过梳理各省份的城镇体系规划、新型城镇化规划及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可以发现,河北、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海南、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3个省份明确提出了2020年和203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具体目标。结合理论模型,本文继续探究2020年和203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目标导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分析要素生产力效应、制度扭曲效应和转移再分配效应的演变趋势。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数量的相对变化直接作用于制度扭曲效应,并间接改变了要素生产力效应和转移再分配效应。表4中2020年和2030年第一列的数据汇报了当技能型人口数量发生改变而其他条件均不改变时,采用数值模拟技术预测的城乡收入差距结果。

表 4 部分地区 2020 年和 2030 年城乡收入差距及三种效应贡献度模拟

省份	2012 年				2020 年模拟				2030 年模拟			
	城乡收入差距	要素生产力效应	制度扭曲效应	转移再分配效应	城乡收入差距	要素生产力效应	制度扭曲效应	转移再分配效应	城乡收入差距	要素生产力效应	制度扭曲效应	转移再分配效应
河北	2.54	13.7	56.5	29.8	1.91	20.25	37.04	42.9	1.43	36.63	-13.91	77.62
江苏	2.43	12.3	61.3	26.4	1.84	18.59	44.28	37.9	1.31	41.97	-25.83	85.59
安徽	2.94	14.9	61.1	24	2.3	18.85	49.47	30.57	1.65	31.35	15.95	50.85
福建	2.81	11.6	72.2	16.2	2.09	16.58	60.49	22.45	1.74	22.07	47.42	29.88
江西	2.54	-1.7	74.3	27.4	1.93	-3.07	62.89	38.73	1.55	-4.61	44.32	58.1
山东	2.73	7.4	78.2	14.5	2.01	11.02	67.77	21.26	1.43	21.52	37.1	41.5
海南	2.82	86.7	-5.3	18.6	2.33	106.42	-28.63	22.54	1.75	160.85	-94.42	34.06
贵州	3.93	1.9	80.6	17.5	3.09	2.62	76.65	21.19	2.48	3.25	71	26.32
云南	3.89	11.2	74	14.8	3.27	12.53	70.42	16.78	2.37	17.2	59.39	23.04
甘肃	3.81	1.4	83.9	14.7	3.11	1.75	80.97	17.53	2.36	2.31	74.85	23.16
青海	3.27	38.9	45.5	15.6	2.49	50.83	29.58	19.99	1.99	67.39	6.64	26.5
宁夏	3.21	-11.4	92.2	19.2	2.6	-13.38	90.45	23.35	1.95	-19.14	86.33	33.41
新疆	2.8	20.6	71	8.3	2.1	28.99	59.94	11.62	1.65	42.96	40.64	17.21

注:三种效应贡献度的单位量纲为“%”。

从表 4 可以发现,随着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收入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例如,河北城镇化水平由 2012 年的 46.8% 提高至 2020 年 60% 的目标值,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由 2.54 下降至 1.91;若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至 2030 年的 70%,则使城乡收入差距下降至 1.43 的理想水平。因此,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

具体观察表 4 中三种效应贡献度的模拟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制度扭曲效应的贡献度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以山东为例,其制度扭曲效应的贡献度由 2012 年的 78.2% 下降到 2020 年的 67.77%,并进一步下降到 2030 年的 37.1%,这也印证了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有利于逐渐消除城乡间不合理的制度障碍。二是要素生产力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愈来愈大。如江苏要素生产力效应的贡献度由 2012 年的 12.3% 提升到 2020 年的 18.59%,若达到 2030 年人口城镇化目标,要素生产力效应的贡献度则进一步提升至 41.97%,处于城乡不同部门中的要素均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使要素生产力不断提升。这也充分说明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落实,制度供给更加充分、更加合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突出,此时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的生产力差异,取决于创新、知识等高端要素的收入回报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了城乡收入差距演变机制的系统性理论框架,重点分析了制度扭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的亮点是分别构建了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理论模型,找到了分离出制度扭曲效应的切入点。研究发现,制度扭曲效应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能够解释 2/3 以上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着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收入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制度扭曲效应的贡献度呈不断下降趋势。城乡收入差距分解深入要素回报、制度安排等层面,再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内在机制及其动态变化,有效弥补了城乡收入差距演变逻辑和机理研究的不足,符合追求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和补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性短板的深刻内涵,为

制定出台优化城乡收入分配格局的有效政策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换一个视角,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合理的城乡收入差距与不合理的城乡收入差距两部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纯粹的要素回报的异质性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视为合理的城乡收入差距。当要素回报受制度不均衡供给、资源配置扭曲等因素影响时,此时的城乡收入差距就增加了不合理的成分。当前,国家进一步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着力改革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优化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加大城乡关系调整和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力度。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渐深入,制度安排将更加协调均衡,城乡融合发展的格局将加速形成。

参考文献:

1. 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2. 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3. 蔡继明:《中国城乡比较生产力与相对收入差别》,《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4. 陈钊、陆铭:《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5.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6. 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管理世界》2010年第1期。
7. 高宇明、齐中英:《基于时变参数的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8. 韩其恒、李俊青:《二元经济下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化研究》,《金融研究》2011年第8期。
9. 雷根强、蔡翔:《初次分配扭曲、财政支出城市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
10. 李实、赵人伟、李思勤:《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11.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12. 林毅夫、蔡昉、李周:《对赶超战略的反思》,《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
13. 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14. 林毅夫、陈斌开:《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4期。
15. 田新民、王少国、杨永恒:《城乡收入差距变动及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16. 万广华:《城镇化与不均等:分析方法和中国案例》,《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17. 万海远、李实:《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
18. 王弟海:《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
19. 王延中、龙玉其、江翠萍、徐强:《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以社会保险为例》,《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
20. 王永钦、高鑫:《内生二元结构的政治经济学:公共品、劳动力市场与税率》,《世界经济》2016年第2期。
21. 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22. 杨曦、彭水军:《碳关税可以有效解决碳泄漏和竞争力问题吗?——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分析》,《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23.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24. 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25. Acemoglu, D., & Robinson, J. A.,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5, No. 4, 2000, pp. 1167 - 1199.
26. Kanbur, R., & Zhang, X., Fifty Year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Journey through Central Planning, Reform, and Opennes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 No. 1, 2005, pp. 87 - 106.
27. Kostova, T., Success of the Transnational Transfer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with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1996.
28.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1, 1955, pp. 1 - 28.
29.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 71, No. 6, 2003, pp. 1695 - 1725.
30. Sicular, T., Ximing, Y., Gustafsson, B., & Shi, L.,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ol. 53, No. 1, 2007, pp. 93 – 126.

31. Wan, G. , Understanding Regional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rends in China: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Review of Income & Wealth*, Vol. 53, No. 1, 2007, pp. 25 – 34.

32. Yang, D. T. , Urban-bi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1999, pp. 306 – 310.

Institution Distor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 A Comprehensive Decomposition Framework

SUN Huache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Shandong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250011)

JIAO Yo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50031)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based on the key role of institution distortion, which is decomposed into factor productivity effect, institutional distortion effect and transfer reallocation effect. Furthermore, combining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are analyzed, and the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2020 and 2030 is simulated and predicted, based on the reform proces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go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stitutional supply effect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he factor productivity effect and become the biggest contributor of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67.8% , and its influence is more obvious in the relatively back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 The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show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 feature, but the time to arrive at the “U-shaped” curve peak is obvious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with the peak arriving for most provinces (cities) in the three years of 2006, 2007 and 2009.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has found that i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is in place, and the goal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s achieved, urban and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will be further reduced. By that time, the contribution of institutional distortion effect will be declining,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factor productivity effect more significant. The conclusion can boost the confidence and determination in strengthening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innov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proves the policy effectiveness of the ongoing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especially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Keywords: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stitutional Distor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Numeric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JEL: O15, D24

责任编辑:非同